

# 禮讚背後的省思

## ——評楊儒賓《1949禮讚》

● 林桶法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 一 前言：1949為何重要

《1949禮讚》（引用只註頁碼）作者楊儒賓主要研究領域為先秦哲學、宋明理學、東亞儒學等，著有

《儒家身體觀》、《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等專書<sup>①</sup>。楊儒賓深處八方風雨交會的島嶼，距離1949年不久後出生，但卻花上許多時間追索「1949」的意義。1950年代出生的台灣學者有一些共性，他們受到冷戰局勢的影響，歷經戒嚴時期的各種限制，渴望尋求理解台灣人文定位的突破。楊儒賓試圖從關鍵的1949年的原點去思考，辦了一系列的展覽（2009年在歷史博物館籌劃「1949——新台灣的誕生」展覽，在清華大學舉辦「收藏1949」展覽）；也做了許多場演講，陸續寫了一些文章。那些本來只是作者反思當前中國文化問題的論著，但他期望引發更多的公共論述（頁22），終於在2015年集結成《1949禮讚》一書出版。

作者在書中的〈1949大分裂與新漢華人文知識的再編成〉一文提到：到了1949年，台灣政治的屬性才產生了質的巨大變化，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中華民國—台灣的一

到了1949年，台灣政治的屬性才產生了質的巨大變化，最關鍵的因素在於中華民國—台灣的一體化。作者強調1949為台灣帶來許多文化財產、人才、學術機構等，並說明應將1949年以來台灣的文化發展放在學術的脈絡上討論。

1949年在台灣之所以特別受到關注，主因在於情感。許多專書較關注的是1949年「離散」的過程，楊儒賓的《1949禮讚》則將1949放在一個大時代中去檢討，用「禮讚」來看待1949。

體化。如果說1949在台灣政治的脈絡中是個充滿爭議的符號，近代常見的詞彙如民主與威權、激進與保守、現代與封建、核心與邊緣等二元對立的概念都可從中找到源頭的話，人文學術的發展也不例外。作者強調1949對台灣人文學術的發展極為重要，但並未得到合理的評估，原因在於人文學術的觀點在1949的眾多史觀中缺席，人文常被科技理性與政治意識形態綁架。作者以台籍菁英蔣渭水的思想及林茂生在「台灣光復節」熱情洋溢的致詞為例，認為原本台灣意識與漢族意識或漢文化意識是可以在1945年抗戰結束後得以融合的，然而由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發生，使台灣意識在同族的外來政權統治中找到「獨立自主」的陳述與目標。最終作者還是將這些政治的問題拉到台灣學術發展的主軸上，強調1949為台灣帶來許多文化財產、人才、學術機構等，給台灣提供了有史以來未曾有的發展機會。作者用心地說明應將1949年以來台灣的文化發展放在學術的脈絡上討論。

作者提到1661、1895、1949是影響台灣歷史最關鍵的三個年份。1661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漢人移民作為台灣社會變遷的歷史主軸就此奠定。1895年，日人據台，台灣很快淪為新興帝國主義者的殖民地，迅速捲進了「文明化」的現代性進程，進入現代的世界體系。1949年的歷史地標則是國民政府敗退入台，結果是前所未見的大量移民湧入台灣。1949創造了「兩岸三地」的新知識範疇，作者指出，

共產黨認為1949年以後有了新中國，同樣我們也有理由說：1949年以後有了新台灣與新香港，而且新台灣與新香港是中國逼出來的（頁61）。對某些人而言，1949年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但對台灣地區的「外省人」而言，絕對是刻骨銘心的一年。1949年的逃難迫使他們遠離故鄉，甚至再也沒能回家。因此，歷經一甲子之後，台灣學術界出現大量的作品追述這段失去的歲月，如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從文學的角度探索1949年的問題；齊邦媛的《巨流河》開啟文學家與歷史事件的對話；劉維開的《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以及拙著《1949大撤退》，則嘗試從歷史的角度針對蔣介石及120萬人的離散進行討論②。

1949年在台灣之所以特別受到關注，主因在於情感。經歷1949年動盪的120萬「外省人」原本有歸鄉的理想，「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是許多人的夢想，直到1987年開放探親後，回到故里，景物未必在，人事幾全非，只好再度回到台灣，這種「誰知他鄉變故鄉」的惆悵，不是那些未曾經歷離散者所能體會。1949年來台的「外省人」有共同的回憶、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敵人」（日本和中共），他們到達台灣後努力堅守崗位，並已在台灣開枝散葉，但總還是有一種被視為「外客」的感覺。這種情感反射在許多場域，也投射在對1949的關注；同時也影響到第二、三代「外省人」的「中國」情懷。

1949年對某些人而言是句點，對某些人是破折號，對一些人則是起點。分離兩岸對大多數人而言不是選擇而是被選擇，那是無奈的時代。龍應台、齊邦媛等人或許就是在這樣的情懷下，用文字表達他們的無奈及遺憾，也替許多人解開鄉愁與徬徨。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頁首就提到：「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有的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後記〉中又提到：「有幸能和我的同代人這樣攜手相惜，一起為我們的上一代——在他們一一轉身、默默離去之前，寫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向他們致敬。」<sup>③</sup>王鼎鈞在《關山奪路》提到：「我不是寫我自己，我沒有那麼重要，我是藉自己的受想行識，反映一代眾生的存在，希望讀者了解、能關心那個時代，那是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經驗。」<sup>④</sup>在經過1949年一甲子的熱潮之後，楊儒賓的《1949禮讚》，特別從學術的脈絡回看1949，值得關注。

## 二 為何要禮讚1949： 內容概述

許多專書較關注的是1949年「離散」(diaspora)的過程，楊儒賓的《1949禮讚》則不太一樣，他將1949放在一個大時代中去檢討，用「禮讚」來看待1949。嚴格而言，《1949禮讚》並不是嚴謹的學術著作，而是具有反思性的論集。本書

收錄的文章有的是展覽演講初稿的整理，有的是專題演講，有的是隨筆，雖然零散，但卻有一個清晰的脈絡貫串全書——那就是如何看待1949，特別是從學術的脈絡。

初看書名或許會讓人感到疑惑：1949年是一個逃難的年代，是許多人苦難的記憶，甚至是一個國家被迫遷徙流離的歲月，為何要「禮讚」？作者想要歌頌哪些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該書從書名到權威的序文都引起關注，作者似乎要反思1949在整個台灣當前的學術角色及其延伸的時代意義，因此該書不僅只是二十餘篇短文的連綴而已，在分開閱讀的過程中，仍可掌握其思想脈絡的一貫性。

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的序文開啟了1949的對話，點出台灣當前的一些問題，在一片「反中」熱潮中，推崇楊儒賓的觀察——即將1949年作為中華文化「南渡」的終點，甚至將之比擬歷史上永嘉、靖康時期「南渡」的文化意義；中華文化「南渡」隱含着文化內部的衍異、斷裂、寄生與再生。王德威認為：本來從學術的角度而言，這是一個極正常的現象，但在當前「中國」被標籤化的氛圍下，有些人刻意排斥和排擠與「中國」相關的內涵，然而試想如果我們將1949年「南渡」文化從台灣抽離，台灣文化又會是何種面貌？

《1949禮讚》全書分為四大部分，每個主軸用四到七篇短文論述。第一部分「1949論」可謂總說，從文化、社會、人民等角度敘述1949的重要性；第二部分「1949與民國學術」，論述台灣在中華文化

1949年是一個逃難的年代，是許多人苦難的記憶，甚至是一個國家被迫遷徙流離的歲月，為何要「禮讚」？作者似乎要反思1949在整個台灣當前的學術角色及其延伸的時代意義。

的地位；第三部分「1949與兩岸儒學」，說明儒學在台灣的發展，可能是作者最關注的問題；第四部分「1949與清華大學」，以作者任教的清華大學為個案，說明中國學術「南渡」的影響，有論述台灣傳承學術文化的意涵。

在第一部分「1949論」，作者在首篇〈1949的禮讚〉中清楚指出：

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各有他們的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之於新中國，主要是政治的意義；一九四九年之於新台灣，則是文化的意義。（頁32）

1949年湧進台灣的文物之質與量，遠遠超過以往三四百年的任一時期。文物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除了眾所周知的大量軍警及政經技術人員外，還有許多有名望的知識份子也因義不帝秦或個人選擇來到此地，他們參與台灣的建設與成長，融入台灣社會，他們的精神活動成為塑造今日台灣面貌的強有力因素。此外，在台灣可以看到中國佛教史上最典型的人間佛教、哲學史上最具有創造力的新儒學，台灣擁有從日常飲食到極精緻的戲劇文化，即使是流行的庶民文化，從一般生活到流行樂壇，我們也看到傳承與創新。在文化的意義上，台灣比任何華人地區更有資格代表漢文化。這就是1949的意義——作者希望台灣人民將它從苦痛的記憶轉化為傲人的記號。

〈歷史災難與文化傳播〉與〈歷史災難與歷史機會〉是作者對歷史災難的反思。災難有雙重的構造，

其意義需要透過歷史演進的過程才能顯露出來。中國歷史上的永嘉與靖康之難，都是歷史的災難，但同時也帶來南方文化的蓬勃發展。作者認為1949的意義不在一時的政治得失，而是牽涉到漢文明或東亞文明板塊的轉移；他強調：1949是新台灣的誕生，這種視角不會使得1949年的苦難變得幸福起來，但可以使我們更謙卑，也可使我們更自勉。

在〈1949與新儒家〉中，作者提到從大陸逃難到台灣的知識份子有兩種人：一是文化傳統主義知識份子，如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一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如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梁實秋等，這兩系人物的思想頗有交集。事實上，自由主義者所標舉的民主與自由理念相當程度上已成為當時人們的共識；文化傳統主義可說無人不擁戴之，而且被視為儒家在當今社會最需堅持的理想目標。文化傳統主義與自由主義理念日漸成為台灣文化最核心的價值（頁58-59）。此外，台灣在1949年承續了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及各種類型的文教機構，使台灣在文化傳統傳承上享有更優勢的地位。作者並強調1949年大流亡潮的文化意義遠超過永嘉與靖康朝的南遷。

在第二部分「1949與民國學術」，作者花了不少精力敘述1949大分裂之後台灣的角色與意涵。他提到1949年台灣人文學術急遽變化的三個因素：其一是文化財產的因素：台灣此時湧進全世界歷史及台灣四百年史上都難得一見的珍貴

作者認為1949的意義不在一時的政治得失，而是牽涉到漢文明或東亞文明板塊的轉移；他強調：1949是新台灣的誕生，並強調1949年大流亡潮的文化意義遠超過永嘉與靖康朝的南遷。

文化財產，如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圖書館的圖書、字畫、器物；其次是人才因素：在1949此象徵性的年份，許多學人或重要文化人或因國府的「搶救學人計劃」，或因各種公私因素，輾轉來台；其三是學術機構的大量增加：在日治時期台灣的學術機構有限，1949年前後有中央研究院及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及人員相繼遷台。由於文物、人員、機構三方面的因素，1949給台灣提供了有史以來未曾有的發展機會（頁111-13）。

第三部分「1949與兩岸儒學」討論台灣儒學史的兩個關鍵性時間點，即1911年梁啟超一行人來台以及1949年新儒學的入台（頁190）。1911年來台的儒學者有梁啟超、湯覺頓及梁令嫻。梁啟超來台影響霧峰林家的議會路線。作者特別提到：台灣史上有兩個「二二八」，它們同等重要。一個指的是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一個是1911年二月二十八日（陽曆3月28日）梁啟超、梁令嫻、湯覺頓應林獻堂及台灣詩社櫟社的邀請抵台，對台灣議會民主路線帶來極大的影響（頁237-38）。1949年來台的則是規模更大的儒家群體，就哲學學者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可為代表。1949年來台的知識份子讓當時島內的儒家傳統和大陸的儒家傳統完成整合，新儒家在台灣找到落實的立基處（頁199）。

第四部分「1949與清華大學」以清華大學為例說明清華大學和中華民國國體，以及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

院等重要文化及學術機構，聯合構成民國史上第三度偉大的遷移事件（頁281）。作者強調：「可以媲美東晉、南宋的遷移者，不是明末也不是抗戰，而是一九四九的國府南遷」（頁283），並強調台灣是民國學術的傳承者。

作者用上四大部分，以一連串的短文說明1949在歷史上的地位，特別關注的是學術及文化史的意義，並讚歎儒學在台灣的傳承，這或許是作者為何要禮讚1949的原因所在。

### 三 禮讚的反思

當台灣的價值被肯定的同時，是否有人省思何謂「台灣價值」、台灣的學術根基、台灣的過去和未來？每個人都可以正義凜然地說「人權」、「自由」、「正義」、「法治」、「真相」等讓大家都覺得偉大而不能反駁的名詞，但卻出現許多矛盾與價值混淆，高喊平權者常無意地輕蔑不同族群，談論民主者在跨越新世紀之後卻不知「民主」的真正涵義，這些在台灣已經司空見慣。儒家文化的內涵不僅被忽視，甚至常會被視為是「中國」的符號，而「中國」已被政治化，以致有時難有理性討論的餘地，在許多場域內只容許共同的語境，幾乎沒有太多對話的空間。

當然，如果只是這樣膚淺地評論台灣的現象，對於許多專研於自我領域，固守學術理想，並同時正在台灣各個角落努力付諸實現的學者並不公平。然而，為甚麼大部分

當台灣的價值被肯定的同時，是否有人省思何謂「台灣價值」、台灣的學術根基、台灣的過去和未來？在台灣，儒家文化的內涵不僅被忽視，甚至常會被視為是「中國」的符號，而「中國」已被政治化，以致有時難有理性討論的餘地。

作者雖無意批判當前的「反中」意識，但又想清楚說明1949對民國學術、兩岸學術以及華人文化圈的重要性。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實際上不只是負面的政治事件，而是在學術文化上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與貢獻。

兢兢業業努力於自我角色實現者的聲音沒有被聽到？我們聽到的不過是被集體塑造的聲音而已。「打破權威」、「批判威權」、「轉型正義」成為最流行的口號，但其實有多少人了解口號背後真正要追求的價值？台灣過去百年來經歷過許多苦痛，但也成就許多令人驕傲的果實，如胡適、傅斯年、殷海光、徐復觀、牟宗三等帶來的自由、民主及新儒學的價值，以及延續日治以來林獻堂、蔣渭水等人所關注的台灣主體性文化。「中國文化」與「本土文化」的相遇應該可以像梁啟超與林獻堂第一次相遇般成為美談，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這中間有太多原因，可能要從歷史的脈絡中尋找答案。

《1949禮讚》是一本相當用心的論集，雖由短文組成，並且有許多重複的敘述，如將1949年遷移和東晉、南宋的遷移擺在同樣重要的位階（頁62、76、132、283）；又如說明新儒學來台及台灣人文傳承的意義（頁58、112、122），但楊儒賓將1949對台灣的意義作了極細膩的分析，大歷史的脈絡亦相當清楚，特別是從學術史的角度看1949，經過一甲子之後，這樣的關懷確實有其意義。或許作者想要表達的是：「中國」對台灣而言不是負數，而1949年正是連接台灣與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年代。

作者雖無意批判當前的「反中」意識，但又想清楚說明1949對民國學術、兩岸學術以及華人文化圈的重要性。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實際上不只是負面的政治事件，而是在學術文化上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與貢獻。1949是台灣雙

源的匯流，東西匯合、海陸交叉，是本土化、兩岸化、國際化的聚合。作者籌劃多次的展覽、搜集許多的資料，探索自我的定位與台灣的未來，用禮讚代表着肯定，每一篇短文都是嘔心瀝血的結晶，這是龍應台、齊邦媛等個人回憶作品所無法完成的思考，更是學術歷史著作所缺乏的延伸討論。

雖然作者用心於禮讚1949，但是我們也可以從另一角度提供一些思考。1949是個逃難的年代，在民國歷史上有兩個大的逃難潮，一是抗戰時期人民的遷移，一是1949年前後人民遷徙或逃難到台。加拿大民國史專家拉里(Diana Lary)於《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The Chinese People at War: Human Suffering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一書提到：「戰爭帶來破壞性極大，這個效應在戰爭結束後，通常還會繼續影響着人們，那就是家庭的離散。」<sup>⑤</sup>或許從文化發展的角度而言，戰爭對遷徙目的地的人文與地域的發展產生了質變與量變，就像中國西南地區如果沒有抗戰時期的遷徙，大學的數量仍然有限、教育與文化或許仍然受忽視，經濟的發展或許仍然處於邊陲；台灣如果沒有1949，大陸中原文化不會迅速在台灣茁壯，人們可能無法直接而全面地欣賞到中國過去精緻的文化作品。民眾逃離原鄉，他們的人生也會發生一些改變，或許有些人遷離之後在異鄉抑鬱而終，但也有些人會有更好的發展。記得有一次中研院院士張玉法無意中向筆者提到：「如果不是國共內戰，我留在山東，或許只是

個農夫。」這或許是謙虛之詞，但戰亂改變人的一生是可以確定的。雖然戰亂帶來一些新的發展契機，但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用「禮讚」來看待歷史的苦難，畢竟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作者看到1949大遷移的文化意涵，卻忽略了戰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作者一再強調1949是新台灣的誕生，也說明台灣現在的發展是「中華文化」漢族意識與日治以來「台灣意識」文化的匯流，這就是流行的「Y字形」理論。不過，若站在地域的自主性立場來看，沒有一個地區會完全接納來自其他地區的文化移植，不論這樣的引進是像五四時期知識份子主動迎合西方文化，還是像1949年政治大遷移下流亡知識份子帶來的文化思想衝擊。因此與其說是匯流，不如說是另一種移植。

此外，作者將台灣在日治時期的文化視為異質文化，如認為「台灣意識原來在異族（日本）的外來政權統治中形成，現在又在同族的外來政權統治中似乎找到『獨立自主』的目標」（頁107），這樣的論述也非恰當。漢文化的底蘊早為大漢和文化所接納，台灣在日治時期也並不欠缺自由主義的思想，只是內涵不同，許多人如林獻堂、蔣渭水等組織台灣文化協會，並發起台灣議會請願運動都可作為說明。即使台灣是被殖民的地區，但普遍民眾的受教育率遠高於當時的中國；當地亦設有相當頂尖的台北帝國大學等學校。民眾雖然在日治的壓力之下無法全面地學習漢語，但民間社會仍潛藏着中華文化的內涵。

另一方面，徐復觀等人來台後引入的新儒學，是否受大多數人重視、自由主義思潮在1950至1970年代是否被接受，都是極大的問號。李明輝指出：「1970年牟宗三與徐復觀先生遷居香港後，新儒學的影響力便大幅消退。」<sup>⑥</sup>漢文化如果指的是「仁義禮智信」，那早就不是中研院史語所所要追求的終極目標；當世界「漢文化」學術討論會上台灣地區的學者被邊緣化的同時，我們是否仍可以說台灣是華人地區漢文化的代表？何乏筆在〈1949年與台灣的跨文化潛力〉一文指出：「今天台灣不僅很難與西方學術競爭，似乎也逐漸落後於中國大陸的研究脈動。」<sup>⑦</sup>當前兩岸儒學的發展各有脈絡，經過六十年之後都產生一些質變與量變，我們確實不能過於誇大台灣新儒學的意義。

學術不僅是承續，更有其濡化的過程，民國學術或許在1980年之前的台灣具有絕對的影響，但1980年代後經過濡化的過程已加入許多新的元素，而這些新的元素甚至和早期的民國學術精神截然不同。以台灣歷史學科的發展而言，大約可分為三個大時期：第一期（1950至1960年代）：這時期台灣以「史料學派」、「傳統學派」為主流<sup>⑧</sup>。由於大陸為中共「解放」，一些歷史學者紛紛來到台灣，成為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的主幹，較有名的代表人物有傅斯年、錢穆、姚從吾、李濟、董作賓、方豪等。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當時中研院史語所、台灣大學歷史系、師範大學史地系成為遷

雖然戰亂帶來一些新的發展契機，但這是個苦難的時代，用「禮讚」來看待歷史的苦難，畢竟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作者看到1949大遷移的文化意涵，卻忽略了戰爭所帶來的社會問題。

台初期的史學三大系統。第二期(1960至1980年代)：這時期有些受西方史學影響的學者展開社會史的研究，代表人物有許倬雲、陶晉生、毛漢光等，他們積極將史學與社會學結合。其時重要雜誌有李亦園等創辦的《思與言》、陶希聖的《食貨月刊》、余英時的《史學評論》。此外，1970年代台灣因為政治變動，開始重視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郭廷以成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培植張玉法等學者。第三期(1980年至今)：這一時期的歷史研究者關注於台灣史、新文化史研究，並有《台灣文化》、《台灣研究》等刊物出版，代表人物有陳奇祿、曹永和、陳紹馨等。這是口述歷史的輝煌時期，解嚴後研究尺度放寬，過去被視為禁忌的課題開始成為學者研究的對象，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事件等。其時田野調查興起，本土意識高漲，研究者甚至將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對台灣的田野調查工作拓展得更細膩。經濟史、新文化史漸受重視，政治史、軍事史研究逐漸被忽視。研究者重視新文化、重視底層民眾、重視個人身體的概念等。

如果用這樣的脈絡來檢視楊儒賓的論點，可以發現所謂民國學術與台灣的融合，在1980年代以前較為明顯；1980年後台灣的史學研究是民國史學、日治學術源流及世界新史學的結合，大眾史學、新文化史成為另一個主流思想。同理，台灣哲學的發展亦非是民國「南渡」的傳承。「流離」與「歸屬」是人類古老的生存體驗，兩者表面

相反，實則互相依存，互為因果。但這是從民眾的角度來思考，而如果從文化或學術的角度來看，則融合與創新可能更為重要。「南渡」是一個過程，學術是否因為找到立足點而得以傳承，可能不是自由主義者或傳統知識份子關切的重點，或許他們更關心這樣的涵養對當地帶來何種價值的建立。作者在此方面的論述過於簡單化與理想化。

作者有許多的敘述是相當正確的，如談1949年帶來的文化匯流時提到：「這是場寧靜的革命，島內的本土文化與島外的大陸文化這兩股文化激流匯合成有機的整體。」(頁96)又如他提到1949年從大陸來台的人確實對台灣產生一些影響，如儒學、故宮文物及台灣的高等文化與學術研究等。但正如文學家葉石濤在分析戰後初期移民者的結構時提到，光復不久到台的大陸移民大約可分為以下六種成份：其一，是陳儀的班底，大多數為陳儀在福建省主席任內所培養的統計幹部；其二，為國民黨各派駐台先遣隊份子；其三，是由於國共戰爭摧毀企業基礎，為避免大陸的亂局而想在台灣這塊世外桃源建立一番事業的、屬於資源委員會系統的非政治人士；其四，是在台灣求發展的老留日份子；其五，是為逃避漢奸罪隱姓埋名來台混水摸魚的舊滿洲國、汪政權有關份子；其六，是依靠語言可以溝通便利的閩籍來台淘金者<sup>⑩</sup>。這些份子相當複雜的，正向的因素雖有，但負向的因素也不少。中國大陸各省共有

「南渡」是一個過程，學術是否因為找到立足點而得以傳承，可能不是自由主義者或傳統知識份子關切的重點，或許他們更關心這樣的涵養對當地帶來何種價值的建立。作者在此方面的論述過於簡單化與理想化。

120萬人撤退至台灣，對人口族群(ethnic group)結構產生直接及即時的影響<sup>⑩</sup>。移民者當然也希望獲得認同，然由於歷史因素產生許多不和諧性，族群衝突與融合成為台灣社會變動的因子。

作者在討論台灣的學術脈絡之外，也重視一些個體的影響，如梁啟超的來台、徐復觀在台與「本土」知識份子的交往等，作者討論了這些人與台籍菁英的交往過程。〈瀛島百年一任公〉、〈二二八百年祭〉等文都在說明梁啟超來台及其與櫟社交往的經過，作者強調梁啟超百年前到台一遊，不僅在台灣史上留下不可抹滅的足跡，放在台灣儒學的政治現代性的視野下定位，它的意義一樣重大。這些個別的探討，或許用白描的方式可以凸顯大陸學人與台籍知識菁英的一些連結，但如果視為強連結則未免牽強。例如提到梁啟超在1911年提出議會路線取代武裝抗爭，櫟社知識份子受其啟發，日治台灣政治運動自此確定下來。梁氏來台與櫟社知識份子交往是事實，但這與1918年夏林獻堂籌組「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及其後的議會請願運動並無直接關係<sup>⑪</sup>。

#### 四 結語

民國歷史上人民歷經許多的顛沛流離，戰爭不斷是民國史的特點之一，每一次的戰爭都帶來許多的離散。「離散」在人類的生活，是一種不分古今中外、由來已久的現

象，因為人是一種需要聯結與歸屬的動物，偏偏在生命中我們除了與其他人、事、時、地、物締造聯結與歸屬外，也可能會因為各種原因，或被迫、或自願地割捨這些與自身相連的牽絆，這便形成了生命中的離散；離散的對象可能是親人朋友、可能是國家故鄉，甚至是對於自我及生命的迷失。自近代以來離散已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但離散後他們大都能落葉歸根，如抗日戰爭中，許多人因為戰亂、災荒而逃難，但終究可以回到原鄉。國共內戰帶來的分離，特別是1949年的逃難，使許多人遠離故鄉，甚至再也沒能回家(包括蔣介石在內)。歷經一甲子之後學術界出現的大量作品主要重在敘述相關過程，2009年《思想》雜誌第十三期以「一九四九：交替與再生」為題，集結不少學者討論1949的涵義，但並不全面，《1949禮讚》一書能以文化及學術的角度思考此一課題，值得肯定。

當然我們不應從太多的細節檢視本書，雖然作者不想高談一些政治問題，但學術與政治是否能截然劃分，我們仍需掌握大歷史的脈絡。1949是新台灣的誕生還是過去的延續？答案當然是延續，自由主義與新儒學都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才迸發出來；來台的人文主義學者自然有其地位與影響，但也別忘了中研院事實上只有兩個所(史語所、數學所)到了台灣，中研院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院士到了台灣，1948年底到1949年的「搶救學人計劃」並不算成功，其他許多菁英

1949是新台灣的誕生還是過去的延續？答案當然是延續，自由主義與新儒學都不是中華民國在台灣才迸發出來。但台灣的價值不是只有傳承，創新與再適應也相當重要。

中華文化在台灣是許多因緣的結合，是許多知識份子努力傳播的理想，在發展的過程中或許有許多的斷裂，然而立足台灣，以東亞為範疇，以文化及學術史為脈絡應該是一條可行的道路。

如陳寅恪、陳垣(援庵)、郭沫若、張瀾等還是留在大陸。即使經過文化大革命，有些知識份子受到牽連，但潛沉於各地的文化底蘊並沒有被連根鏟除，因此台灣不能自視於結合本土化、兩岸化與國際化而自滿，因為這樣的優勢已隨着內部輪番的爭議與懷疑而逐漸消逝。

本書提醒我們，中華文化在台灣是許多因緣的結合，是許多知識份子努力傳播的理想，在發展的過程中或許有許多的斷裂，然而立足台灣，以東亞為範疇，以文化及學術史為脈絡應該是一條可行的道路。但台灣的價值不是只有傳承，創新與再適應也相當重要，民間潛在的文化傳承，比之於學院大儒一點都不遜色。雖然筆者不完全贊同台灣是民國學術「南渡」的終點，也不會用「禮讚」來歌頌1949，但經過六十年後，如果要找一個對近代台灣帶來深遠影響的年代，也還是會選擇1949。

### 註釋

- ① 楊儒賓：《儒家身體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6)；《異議的意義：近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
- ② 參見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台北：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2009)；齊邦媛：《巨流河》(台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劉維開：《蔣中正的一九四九：從下野到復行視事》(台北：時英出版社，2009)；林桶法：《1949大撤退》(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9)。其他的專書如張典婉：《太平輪

一九四九：航向台灣的故事》(台北：商周出版，2009)；李敖：《大江大海騙了你——李敖秘密談話錄》(台北：李敖出版社，2011)等。此外還有許多紀錄片及電視劇等拍攝，如《1949大遷徙》(紀錄片，2004)；《存亡關頭——1949年的中華民國》(紀錄片，2009)；《驚濤太平輪：1949東方鐵達尼號沉船之謎》(紀錄片，2012)；《老兵日記：1949勸山河》(紀錄片，2014)；《我在1949等你》(電視劇，2009)；《瑰寶1949》(電視劇，2011)等。

③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頁1、361。

④ 王鼎鈞：《關山奪路》(台北：爾雅出版社，2005)，頁434。

⑤ 拉里(Diana Lary)著，廖彥博譯：《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107。

⑥ 李明輝：〈如何繼承牟宗三先生的思想遺產？〉，《思想》，第13期(2009年10月)，頁191。

⑦ 何乏筆：〈1949年與台灣的跨文化潛力〉，《思想》，第13期(2009年10月)，頁91。

⑧ 彭明輝：〈從歷史學期刊論文分析台灣史學研究動向(1945-2000)〉，《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9期(2002年5月)，頁355-64。

⑨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3)，頁83-84。

⑩ 「族群」的概念源於西方的人類學研究社會實體的一種範疇分類，後來被延伸代表含有共同利益及一定連帶感的人，或指有共同特質與文化傳統的一個群體。

⑪ 參見周婉窈：《日據時代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75-102。